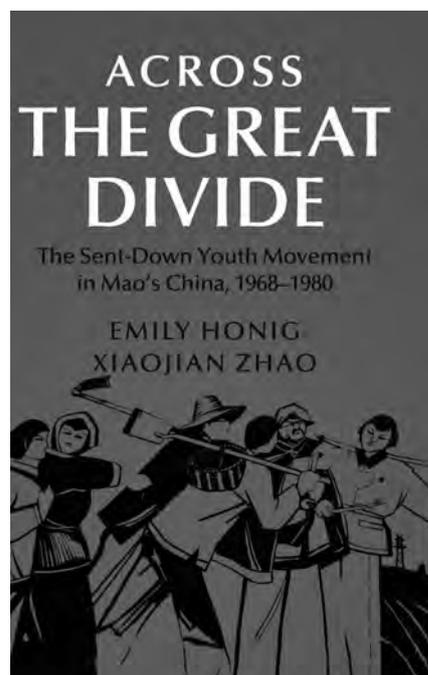


城鄉關係視野下的知青史研究

——評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 1968-1980*

● 金光耀

《穿越鴻溝》不僅記敘上海知青插隊落戶的經歷，而且試圖討論上山下鄉運動如何受制於並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和城鄉關係，尤其重點關注這場運動導致的這兩對關係的分離、聯繫以及相互依賴。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 1968-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韓啟瀾 (Emily Honig) 和趙小建合著的《穿越鴻溝：毛時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Across*

the Great Divide: The Sent-Down Youth Movement in Mao's China, 1968-1980，以下簡稱《穿越鴻溝》，引用只註頁碼) 是一本關於知識青年和上山下鄉運動的新著。與伯恩斯坦 (Thomas P. Bernstein) 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和潘鳴嘯 (Michel Bonnin) 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 這兩本學界熟悉並已譯成中文的著作不同，《穿越鴻溝》不是對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做整體性的研究，而是聚焦於知青輸出城市上海，以及到外地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和他們所在的農村。

本書除導論外，共有六章。第一章「告別黃浦江」，考察毛澤東下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指示後，上海市對中學畢業生下鄉的宣傳和

動員。第二章「農村並不平靜」，關注上海知青到邊遠地區的農村插隊落戶後面臨的困境，以及上海為幫助這些已離開城市的知青所做的工作。第三章「非計劃經濟」，聚焦知青下鄉後產生的城鄉聯繫，如何使農村地區越過計劃經濟的限制，從上海獲得鄉村工業急需的物資、設備和技術，從而產生了上山下鄉運動預期之外的結果。第四章「不合時宜的親密」，討論知青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即女知青受迫害問題；作者從不同於以往的視角，重新審視關於女知青受迫害案件的報告及其處理方式，認為對這些案件的處理方式有所變化是1973年中央30號文件發布及隨後的政治運動的產物。第五章「鄉村中國的城市居民點」，展現中央文件發布後上海加強對插隊知青的幫助，如提供函授教育、舉辦小作坊、向農村提供物資和財政資助，從而使上海知青能夠擺脫艱苦的農活，但這些努力實際上卻加深了城鄉間的分離。第六章「解體」，通過考察招生、招工、病退、困退、頂替等政策的推行，揭示了在1978年底雲南農場知青要求返城前，插隊知青及其父母、農村和城市的幹部和農民已經以他們各自的行為瓦解了上山下鄉運動。在全書六章之後，作者還加了一個「尾聲」，講述近年來老知青回到「第二故鄉」的幾個故事，以及老知青對知青生活的記憶。

從1968年開始，上海市安排到黑龍江、雲南等七個省區插隊落戶的知青超過三十萬（不包括到江蘇、浙江兩省投親插隊的），遠超

北京的十二萬，佔全國跨省插隊知青近半數^①。本書關注的就是這些插隊知青到了遠離城市的農村後出現的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在全國插隊知青中具有普遍性。兩位作者撰寫此書不僅僅是為了記敘知青插隊落戶的經歷，而且試圖在此基礎上，討論上山下鄉運動如何受制於並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和城鄉關係，尤其重點關注這場運動導致的這兩對關係的分離、聯繫以及相互依賴。這兩對關係是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因此本書不應僅僅引起研究知青史學者的關注。

一 下鄉政策被侵蝕

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野下，作者通過從毛澤東下達指示後上海的動員、上海知青到農村後面臨的各種困難，以及最後通過各種渠道離開農村、返回城市的許多事例，表明毛的指示和國家上山下鄉的政策在地方的執行和基層的落實並不是一路順暢、毫無阻力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所有參與者——農村和城市的幹部、家長、慰問團和知青，以明確或含糊、公開或暗中的方式，根據各自的需要來解釋、利用和改變國家的政策，最終導致上山下鄉運動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有關毛澤東下達指示後城市對中學畢業生的動員，以往的研究都有關注，劉小萌在《中國知青史：大潮》中特別指出，根正苗紅的「紅五類」家庭對此反而敢於硬抗，不願下鄉^②。本書對此有進一步的揭

上山下鄉運動的所有參與者——農村和城市的幹部、家長、慰問團和知青，以明確或含糊、公開或暗中的方式，根據各自的需要來解釋、利用和改變國家的政策，最終導致上山下鄉運動以失敗告終。

來自上海的支持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對城鄉和區域間經濟交流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說，知青下鄉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巨大隔閡。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被遮蔽的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又是文革經濟史中被遮蔽的一個面相。

示：作者據上海的檔案資料，考察了著名的棚戶區「藥水弄」。1969年該地區有239名中學畢業生，但最終只有96人下鄉，其餘都拒絕了。這些拒絕者中有30%提出了殘疾、生病等理由，其餘70%則沒有找任何理由，乾脆拒絕下鄉。藥水弄是勞動人民聚集區，拒絕下鄉的學生都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頁35）。作者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對政府下鄉動員最主要的抵抗不是來自所謂的「階級敵人」，而是政治身份沒有問題的工人。而城市基層幹部在向上級報告這些情況時，實際上傳達了被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稱為「有缺陷的路線」(fault lines)的信息，最終影響到政策的調整(頁38)。知青到農村後，在生活、勞動各方面遇到許多困難，上海派遣下去的慰問團將這些困難報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再次傳達了「有缺陷的路線」的信息。因此，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形式推行了兩年後，上海就做出了調整，不再大規模安排中學畢業生插隊落戶。

作者認為，上述表明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國家能力並不是堅如磐石，而是有限度並且脆弱的，基層各種群體常常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侵蝕、瓦解了國家的政策(頁64)。這一解釋讓人不禁想起已故的高王凌教授提出的「反行為」概念^③。

二 城鄉間的中介

相比國家與社會關係，作者對城鄉關係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本書

的書名也充分顯示了此點。上海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身不由己地成為城鄉間的中介，為邊遠農村提供了此前根本無法獲得的與大城市的聯繫。

知青大規模下鄉之初，也正是國家號召各地大辦「五小」(小鋼鐵、小水泥、小化肥、小水電、小機械)工業之時，只是國家基本上不向農村提供相應的財政和物資資源，要各地立足於自力更生。於是，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幹部很快就發現了上海知青在幫助地方發展工業方面的價值。書中舉出很多事例，展現了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幹部通過知青個人和上海派往當地的慰問團，甚至直接到上海找上海市知青辦，尋求物資、技術和人員的支持。而知青因為可以改善個人在農村的生活處境，慰問團和上海市知青辦因為感到對上海的插隊知青負有責任，都願意提供農村所需要的幫助，從上海向邊遠農村提供設備和技術的通道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這些來自上海的支持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對城鄉和區域間經濟交流的限制，尤其是像黑龍江這樣邊遠的地區，如果不是通過上海知青的幫助，根本不可能得到來自上海的物資和技術。從這個意義上說，知青下鄉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巨大隔閡。

作者指出，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先前被遮蔽的一段歷史，而這段上山下鄉的歷史又是文革經濟史中被遮蔽的一個面相(頁85)。但作者沒有進一步指出這段被遮蔽的歷史中存在的一個悖論是，上海能夠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限制，恰

恰是因為上海在這個體制中享有其他城市沒有的經濟特權，所以它擁有可支配的富餘資源幫助邊遠農村的上海知青。本書還列舉了不少知青及其家長向農村地區提供物資和技術支持的事例，作者據此認為這些通過個人渠道的支持可能超過了上海市官方提供的支持（頁86）。不過，這一推論還需有更確切的史料特別是統計資料的支撐，畢竟目前關於這些事例的敘述主要來自於知青的口述和回憶，都是個案性質的，整體規模究竟有多大並不清楚，而官方提供的支持都有較具體的數字。此外，上海市革委會對知青下鄉地區有一個從最初被動的、零星的支持到後期主動的、有計劃的支持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上海市檔案館已開放的檔案中有不少相關的史料。對這一過程的梳理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上海的支持和城鄉關係，但本書對此沒有展開。

上海在動員知青下鄉過程中有一個先於其他城市採取的措施，即派遣由機關幹部組成的慰問團赴知青下鄉的外省區。本書從城鄉關係的視角討論了慰問團，這是以往研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問題。作者指出，慰問團通過提供物資和技術支持等，在上海與知青下鄉的農村間建立了溝通和合作的渠道。慰問團長駐上海知青下鄉的省區，並下伸到地區和縣，它的一個主要任務是了解並幫助解決知青在農村遇到的各種困難，將發現的問題報告當地和上海市革委會。因為這些報告記述的重點是知青下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所以通常會引起當地政府的不滿。作者對慰問團與當地政府

的緊張關係予以特別關注，認為上海派慰問團調查已經沒有上海戶口的知青在農村的生活情況，表明仍然將他們看成是上海市民，也疑慮農民和當地官員對上海知青的關照，這種超越行政管轄權限的行為激化了上海與當地的緊張關係，反而加劇了城鄉間的分離（頁59）。

在談到慰問團的緣起時，作者雖提到了它與下放「五七」幹校之間的關聯，但沒能進一步展開討論上海的慰問團與其他城市如北京、天津的慰問團之間的不同之處。實際上，上海派遣慰問團除了幫助解決知青安置問題之外，最初的目的為了安排那些文革開始後被「精簡」下來的機關幹部，並試圖「摸索和創造幹部與知識青年一起插隊落戶的經驗」，希望創造出一種有別於「五七」幹校的方式對機關幹部進行「再教育」，將一大批機關幹部送出上海^④。因此，應該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來對上海慰問團展開探討，這也能更好地理解上海對知青上山下鄉所採取的與其他省市有所不同的政策。

三 女知青受迫害問題

本書最能夠引起關注，但也最有可能產生不同看法和爭議的是第四章「不合時宜的親密」。作者在這一章的開頭表示，關注女知青受迫害問題不是為了曝光並詳述這類案例，而是要從一個與別不同的新視角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作者主要依據黑龍江和江西兩省幾個縣的檔案資料，試圖通過女知青被迫害案件

上海在動員知青下鄉過程中有一個先於其他城市採取的措施，即派遣由機關幹部組成的慰問團赴知青下鄉的外省區。本書從城鄉關係的視角討論了慰問團，這是以往研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問題。

1973年運動將重點放在女知青受迫害問題，在作者看來，是因為指控性犯罪要比處理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其他各種問題或承認運動失敗容易得多，對此，她們稱之為「政治的性問題化」。

揭示以往研究中未被認識到的政治機制：所有關於這些案件的報告及其處理方式的變化，都是1973年中央30號文件〈關於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及緊隨其後的政治運動的產物。

作者指出，以1973年為分界，地方上處理女知青受迫害案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是地方文件中關於此類案件的用詞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文件中大多出現的是「男女關係」、「同居」、「搞對象」等詞，但此後則使用了明顯包含犯罪的用詞，如「強姦」、「強姦未遂」、「通姦」、「誘姦」、「調戲」，等等（頁94）。其次是中央文件下達後的處理方式比以前更為嚴厲，原先只是作批評處理的案例現在則要重新判刑。黑龍江一個縣有些以前被認為是「不適當」、「不道德」的行為，並且已經做了批評處理的案例，到了1973年則受到重新審查，結果當事人被判刑關進監獄。這個縣1973年判處的二十七件與女知青相關的案件中，只有兩件是當年發生的，其餘都發生在1973年之前（頁101）。此外，在1973年處理女知青受迫害事件運動（以下簡稱「1973年運動」）中，有不少女知青被動員起來揭發男農民。本書列舉的事例中甚至有已經與上海女知青結婚的當地農民被控誘姦、逼婚而被判刑的（頁104）。這些討論確實讓讀者得以從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視角來認識相關案件。

作者從檔案中歸納出兩個發現：一是這些案件的被指控者絕大多數是普通農民，很少有幹部；二是所有受害的女性都是知青，儘管

農村婦女也有同樣的遭遇，或者男知青與女知青之間也有相似的事例，但不在調查和處理之列。

關於第一個發現，與通常以軍墾和國營農場為重點的相關敘述以及人們由此形成的看法有着巨大的差異。作者的解釋是，插隊知青不像農村知青那樣容易接觸幹部，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普通農民成為有權勢的幹部的替罪羊。在處理被迫害女知青案件成為一場運動之時，地方幹部要完成指標，當然就將那些無權無勢的農民塞進了調查報告，於是被指控者中就少有幹部了（頁111）。

對於第二點，身處美國學術環境中的兩位作者顯示出不同於中國學者的學術敏感，檔案中普遍出現的男農民作案者與女知青受害者，使熟悉性別研究的她們聯想到美國內戰後大量報導的黑人男性作案者與白人女性受害者（頁109）。她們認為1973年運動中出現的案件報告製造了不同的社會分類。1973年前的報告（尤其是慰問團的報告）都十分注意不要損害「貧下中農」的形象，而運動開始後的報告中鄉村男子就被妖魔化（demonized）。這些報告表明，「誰」犯罪要比「罪」的性質本身更為重要。

書中有幾個事例顯示處理相似的案件存在着不同的標準：有一個男知青與兩個女知青有性關係並導致其中一人懷孕，對他的處理方式就只是換生產大隊並寫一份檢查；有一個男農民過去與多名女農民有婚外性關係，只是受到批評教育，但1973年他與女知青發生關係，結果被判四年徒刑（頁113-14）。基

於這些事例，作者指出，女知青固然容易受到侵害，但許多男農民也是國家主導的政治運動中易於受害的人。而1973年運動將重點放在女知青受迫害問題，在作者看來，是因為指控性犯罪要比處理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其他各種問題或承認運動失敗容易得多，對此，她們稱之為「政治的性問題化」(sexualization of politics, 頁98)。

以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文學作品中的相關描述，都集中在女知青受凌辱這一面，本書的討論則強調了政治權力運作的因素。作者指出，1973年運動與1950年代以來由中央發起的自上而下的各場政治運動有着一樣的機制，包括迫使個人坦白、處罰犯錯的人，如果這樣解讀運動中產生的報告和留下的檔案，對女知青受迫害問題的範圍和性質就會有不同的認識(頁115)。作者肯定是預料到這一章的論述會引起質疑和反對，因而特別表明，她們不否認也不想縮小上山下鄉運動中女知青受迫害事件的範圍和性質，並且認為未知的案件可能比已經記錄下來的案件更多。

作者將1973年運動看作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確實提供了思考這個問題的另一個視角。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一個規律是：一旦運動被發動起來，就會愈演愈烈，最終必然走向擴大化。這是每一場政治運動都無法避免的。安徽省司法系統編撰的《司法志》記載，1973年，「安徽司法機關在處理這類犯罪中，由於存在着『只要路線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的『左』的思想，致某些地方曾一度出現多判重

判的傾向」^⑤。雖然作者沒有提供多判、重判的具體案例和數據，但透露出的信息為本書的論斷提供了一個佐證。

然而，本書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有一個先天的不足，就是其依據的檔案資料範圍太小。第四章中實證案例的資料來源只是位於黑龍江和江西的四五個縣，其中引用案例最多的兩個縣，考慮到個人隱私用了匿名。例如關於涉案的男性主要是普通農民，書中主要取用了黑龍江一個匿名縣的資料：該縣41名涉案人中，32人是農民、2人是有單位的工人、1人是集體所有制的公路養護工、4人是村幹部，還有包括村支書在內的2名黨員(頁110-11)。且不說作者已經指出這些案件的產生和記錄有權力的因素，就是以一兩個縣的數字得出涉案者主要是普通農民的結論，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史：大潮》列舉了許多女知青受迫害的案例，如吉林省九台縣姦污女知青案犯中有大小隊幹部34人，佔犯罪份子46%；湖北省天門縣迫害知青案犯中60%是農村基層幹部和國家職工^⑥。地方志中也有相關的數據。安徽省1974至1978年迫害知青案件2,528件，其中涉及女知青案件2,408件，這類犯案者中農村社員901人、基層幹部593人、國家工作人員385人、工人348人、五類份子44人；浙江省自1973年起查處了2,557起迫害女知青的案件，犯案者中社員892人、基層幹部669人、國家工作人員241人、工人427人、其他406人，所有犯案者中包括黨

本書依據的檔案資料範圍太小。例如，關於女知青受迫害問題中涉案的男性主要是普通農民，書中主要取用了黑龍江一個匿名縣的資料，以一兩個縣的數字得出涉案者主要是普通農民的結論，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文革時期上海在張春橋的控制下是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基地，討論上海的上山下鄉運動必須置於這一歷史場景之下。例如慰問團是上海在「繼續革命理論」框架下於上山下鄉運動中主動進行的創造性實踐。

員718人^⑦。在這兩個省的統計中，雖然犯案者中社員（即普通農民）人數列在首位，佔比分別為40%和34%，但基層幹部與國家工作人員合起來的人數均超過了普通農民。因此，本書關於普通農民是主要犯案者的論斷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討論。

四 拓寬知青史的研究

儘管第四章的檔案資料來源範圍不廣，但仍顯示了本書在資料使用上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基層檔案館的檔案史料。作者之所以能夠對女知青受迫害問題重新審視，就是因為大量閱讀了幾個縣檔案館的相關史料。由於這類檔案涉及敏感問題，在大多數檔案館都是不對研究者開放的，因此更顯出其史料價值。也由於這些檔案涉及個人隱私，據兩位作者說，還有一些案例沒有寫進書裏，因此對女知青受迫害問題的一些面相無法完全展現。對於上海市的知青動員工作，作者不只是關注上海市檔案館的資料，還使用了不少區檔案館的資料，例如藥水弄的事例就來自普陀區檔案館。但在個別史料的使用上，書中也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例如，作者說1970年復旦大學招生一千餘名工農兵學員，全部來自上海知青下鄉的省份（頁139），但作者引用的資料並沒有這樣的表述。事實上當年復旦大學學生的來源省份非常廣泛，就筆者所了解的歷史學系而言，就有學生來自上海知青下鄉省份以外的湖南、湖北、河北、天津、北京、廣東等省市。

如本文開頭所說，本書聚焦於知青輸出城市上海和赴外地的上海知青，並突出了上海知青工作有別於其他省市的一些特點，如慰問團、物資支持、函授教育等。作者對這些措施的討論，是從上海市革委會和官員如何執行中央政策、如何按自己的理解做出調整、他們的各種努力又如何無意間削弱了上山下鄉運動這一視角切入的。這些討論拓寬了知青史研究的視野，是對學界的一個重要貢獻。但筆者以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不應忽視。文革時期的上海在張春橋的控制下，是推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基地，討論上海的上山下鄉運動必須置於這一歷史場景之下。例如，對於慰問團，本書主要討論它如何緩解上海知青在農村面臨的具體困難，但在當時它還被看作是所謂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上海在「繼續革命理論」框架下於上山下鄉運動中主動進行的創造性實踐，正是這一因素使上海慰問團有別於北京等地的慰問團。

除了上山下鄉運動，在「教育革命」、「文藝革命」等方面，上海都有不同於其他省市的「創新」做法，如以「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學」的「五七文科班」。在對上山下鄉、教育、文藝等領域的具體問題制訂政策或採取措施時，張春橋領導下的上海是從「繼續革命理論」出發來統籌考慮的。整個文革期間，上海最堅定地緊跟毛澤東「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戰略部署」，最積極地實踐「繼續革命理論」，並且在此過程中有自

己的創造性做法。因此，「繼續革命理論」這一意識形態因素在研究上海知青史時應予以特別關注。

讀完本書，感受最深的是其與眾不同的研究取向與視野。現有知青史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國家政策和知青本身，如何拓寬知青史研究的視野近年來已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和討論，如金大陸提出了政治運動史與社會生活史並重而以後者為主導的「雙重框架論」，希望以此來推進知青史的研究^⑥。筆者指導的幾篇學位論文也試圖從上海慰問團、知青的疾病、邊疆與內地等新的視野去拓寬知青史研究的領域^⑦。本書從城鄉關係切入，揭示出以往研究中未被關注的內容，這對今後的知青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啟示。毛澤東1968年12月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針對的是三個對象，即知青、知青家長和農村幹部與農民，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於第一個對象，而對後兩個對象的研究則很少。本書的研究取向關注到了農村幹部與農民，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五 結語

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涉及到當代中國史的諸多方面，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農村史、城市史、青年史，等等。因此，在筆者看來，知青史研究的新進展和突破不能僅僅關注知青本身，而應該以知青為出發點，伸展至與上山下鄉運動相關的各個方面，從中發現當代中國歷史的基本議題，如本書聚

焦的城鄉關係，再如農民與農村問題，進而展開深入的討論。這樣，知青史研究就有望打開一個新局面，它所討論的就不只是有知青經歷的人關注的問題，而是關注當代中國歷史的人都會關注並參與討論的問題。

註釋

① 顧洪章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頁261-62。

②⑥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71；308。

③ 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④ 參見林升寶：〈繼續革命的困局：上海知青學習慰問團研究，1969-1976〉（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5），第三章。

⑤⑦ 參見金光耀、金大陸編：《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第四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頁2798；2679、2798-99。

⑧ 金大陸：〈中國知青研究的學科定位及其理論建設的若干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2期，頁78-82。

⑨ 林升寶：〈繼續革命的困局〉；朱文靜：〈知青的疾病及其應對：以江西省上海知青為中心（1968-1979）〉（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易海濤：〈個人、地方政府與國家：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研究（1963-1981）〉（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針對的是三個對象，即知青、知青家長和農村幹部與農民，現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於第一個對象。本書的研究取向關注到了農村幹部與農民，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